

论大历史观视阈下民族复兴话语的三重叙事

杜晓燕 彭勇刚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摘要民族复兴话语要立足大历史观,以理论、历史与现实三重逻辑,建构具有坚实理论基础、深厚历史根基、重大现实意义的话语叙事体系。从理论逻辑来看,民族复兴话语是一种大历史观下的辩证思考与整体性建构,要以强有力的理论话语叙事增强民族复兴的理论自信;从历史逻辑来看,民族复兴话语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引领与中国式现代化鲜活实践的交互演绎推进,要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维度揭示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趋势,增强民族复兴的历史主动;从现实逻辑来看,民族复兴话语要打破西方“二元对立”的话语陷阱,增强民族复兴的行动自觉,并应进一步从话语传播理念、话语内容体系、话语传播策略等方面,加紧建构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更加匹配的国际叙事话语体系。

关键词民族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大历史观;话语叙事;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23)06-0005-08

DOI:10.14110/j.cnki.cn-37-1059/d.2023.06.008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新征程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作出“两步走”战略安排。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冲刺阶段,加强民族复兴话语建构、实现话语叙事与实践行动的良性互促,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民族复兴话语要立足大历史观,从理论、历史、现实三个方面,构建具有坚实理论基础、深厚历史根基与重大现实底蕴的话语叙事体系,这对于凝聚民族复兴的理论自信、历史主动和行动自觉具有重大意义。

一、民族复兴话语的理论叙事:大历史观下的辩证思考与整体性建构

话语叙事是通过对特定价值体系的理论阐释和言语阐述来获得理解与认同,深厚的理论基础是话语叙事的根本前提。习近平强调要运用大历史观的思维方法来思考民族复兴伟业,民族复兴话语叙事要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民族复兴的话语叙事既是基于对辩证唯物发展观的整体性认识而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基于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准确判断而形成的重要认识,还是基于对人类历史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认识而达成的理性认知,并在当前日益激烈复杂的国际话语斗争中不断增强民族复兴的理论自觉与自信。

(一) 民族复兴话语是基于辩证唯物发展观的整体性认识

辩证唯物发展观揭示出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指出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创造历史、迈向现代化的过程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媒体时代反腐信息媒介接触对公务员与公众清廉感知的影响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9BZZ074)、2019年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延安精神与新时代党的建设”专项“政党认同角度下的‘延安精神’与党风廉政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19ZX2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杜晓燕,女,法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彭勇刚,男,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实现整体性发展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不断寻找文明发展路径而最终选择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持续探索的历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①,中华民族正是在5000年历史的连续性变迁中坚持走以契合我国特殊历史文化需要的文明发展道路而努力实现国家强盛、民族复兴光明前景的。从长周期维度看,民族复兴话语历史指向并不仅仅局限于新时代十多年的变革,而是存续于“由盛到衰再到盛”的中华5000年文明发展史和“由传统到现代”的世界现代化发展史之中。因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直坚持以现代化为奋斗目标,既保持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共性,又维持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性。只有坚持大历史观,才能从根本上摒弃割断历史联系、孤立看待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

(二) 民族复兴话语的根本动力来源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推进解决

唯物史观认为,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向乃至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迈进,生产力都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统一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与现代化的根本推动力量。

从全球化角度看,尽管当下同200年前相比已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已不是以狭隘的地域性而存在,而是融入到世界发展潮流中以世界性而存在。由于生产方式的日益发展和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②。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抛弃旧有的生产关系而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③。无产阶级被创造出来的同时也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社会基本矛盾决定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④。但是在这之前,“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⑤。进而言之,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同现存生产关系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时,当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时,就必然会通过革命或者改革的方式扬弃、超越旧有生产关系。正是由于不同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不断产生和解决,才推动着民族复兴伟业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在民族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节点,我们仍然要牢牢把握住这两对基本矛盾发展变化的规律,既要充分利用经济发展逻辑,主动变革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以激活生产力发展动能,又要坚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主动深化改革以变革上层建筑,在推动这两对基本矛盾有效解决的过程中实现民族复兴跃迁式前进。

(三) 民族复兴话语实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

实现民族复兴是当代中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必须在尊重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中国人民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与唯心史观不同,唯物史观强调“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⑥,是由现实的人而非抽象的人构成,是千百万人民群众而非个别的人推动形成的,因而人民是创造和推动民族复兴的决定性力量。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团结奋斗的美好愿景,也是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必经的历史阶段,因而民族复兴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合规律性强调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的“两个必然”社会发展趋势,在为工人阶级最终目的和利益作斗争的运动中“同时

① 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学习时报》2011年9月5日。

②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404、41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20页。

代表运动的未来”^①，以不断摆脱阶级剥削和压迫来建立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②，人在历史规律面前也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而是在人的主观意志作用下由自发转为自觉、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合目的性”发展过程。在实现民族复兴与人类解放的过程中，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实践主体，是决定目标能否实现的根本力量，必须依靠人民的团结行动。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长河中始终重视人民的主体性地位，也始终努力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满足人民的发展愿望，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实现了民族复兴愿景下的广泛联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开始艰难地但不可逆转地走向伟大复兴”^③，这正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辩证发展的必然结果。

(四) 民族复兴话语在国际话语斗争中不断增强理论自觉与自信

大历史观认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一趋势的实现不能坐等，不能期待生产力会自发发展壮大并自然而然地取代资本主义，而是要主动开展多种形式的斗争。

世界百年变局之下，国家之间的斗争不仅表现为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与摩擦，而且深藏于以意识形态为内核的国际话语权斗争之中。习近平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④。当前，围绕民族复兴的国际话语权斗争愈发激烈，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斗争中，我们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也在斗争中增强了民族复兴的话语自信。近年来，西方某些国家将我们的民族复兴污化为“称霸梦”“复仇论”等，目的是要在国际社会上剥夺我们民族复兴的话语权，利用话语误读和舆论攻击等手段达到阻挠我们民族复兴的企图。习近平十分重视从理论层面上讲清楚民族复兴的深刻内涵和世界意义，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走殖民扩张的西方老路，而是依靠中国内生力量的和平崛起，不仅不会给其他民族带来伤害，还会在互利共赢中促进世界繁荣发展。基于这样的理论认识，我们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强调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这些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深刻认识，表达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发展利益与世界和平发展的话语叙事要求，也极大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力量。

二、民族复兴话语的历史叙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引领 与中国式现代化鲜活实践的交互演绎推进

以大历史观审视民族复兴话语，其显著特征在于体现了民族复兴精神引领与中国式现代化鲜活实践交互演绎推进的双重历史叙事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扬弃和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型现代化模式，具有显著的文明优势、制度优势和道路优势。正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不断引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创建出新型政党制度，使民族复兴有了更加深厚的文化根基、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更加正确的前进方向和更加有力的领导保证。正是百年来有了民族复兴的精神目标指引，中国式现代化才拥有不断开拓创新的强大动力，民族复兴话语才有了深厚的历史底蕴，人民才有了更强的历史主动性。

(一) 5000年文明传承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实现民族复兴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从大历史观来看，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长河中，中华民族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对社会现代化的不懈追求相伴相生，不断孕育着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不断探索出现代化发展的新道路。“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4、295页。

③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页。

④ 《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11页。

主义道路?”^①民族复兴话语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器物层面的现代化道路探索,还体现为深层次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创造出农耕时代的先进文明形态,在经济、文化、技术、制度等方面引领世界发展潮流,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巨大贡献。中华民族还长期保持着与世界文化的交流融合,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开放理念使中国成为世界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与先进文化的积极传播者。15世纪之后萌发的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推动着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然而,近年来,全球治理危机频现,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至今陷入诸多现代性困境之中。习近平强调“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②。与资本主义单向度文明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新形态是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基础上形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悠久文明与新型现代化道路的融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能够推动人类文明实现迭代发展,超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拜物教”“拜金教”的依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刻回应了人类社会要走向何处的深层次问题,打破了西方文明中心论对人类文明形态的话语垄断,丰富了人类社会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话语表达,也激发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自觉。

(二) 500年社会主义运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习近平强调要用大历史观看待我们的民族复兴进程,指出“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③。正是在500多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基础上,中国最终选择了最符合我国国情、代表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与制度话语自信。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社会主义制度从空想变为现实,给人类提供了一种更为先进的政治制度选择,也成为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马克思早在1881年就提出亚细亚国家能够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跨越式发展的历史发展多线论,他强调通过结合社会主义的先进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④。中国也可以跃过“卡夫丁峡谷”直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化体系中,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质疑之声从未停止,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社会主义制度话语逐渐式微,世界上弥漫着“社会主义失败”的论调。然而,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西方学者开始加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反思,2013年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米歇尔·于松出版《资本主义十讲》,指出资本主义的活力正在枯竭。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更是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中推翻了自己的结论,强调当前美国的整个制度体系优势已失灵、制度合法性正在逐渐丧失^⑤。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来看,一方面,“二战”后照搬西方模式推进现代化的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纷纷陷入现代化陷阱之中,“西化”与“民族化”、“希望加快发展”与“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这两对矛盾是产生问题的根源;另一方面,长期坚持以社会主义制度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315页。

② 习近平《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25页。

⑤ [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

体系推进现代化的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繁荣作出重大贡献。可见,西方式现代化并非人类现代化的唯一模式,中国走出了一条区别于西方式现代化的新道路,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世界性话语叙事优势不断增强,更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证与坚实的制度话语自信。

(三) 180年民族抗争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在180多年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与探索救亡图存道路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成功开辟出一条振兴国家与民族的特色道路。习近平指出“中国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走这条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坚定了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信心”^①。这条道路不仅是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扬弃,也是对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超越,增强了我们民族复兴的道路自信。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被卷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历史潮流中,遭受着几近“亡国亡种”的民族危机,这让当时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必须尽快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如何追赶世界现代化潮流,如何使中国实现追赶超越式发展,在当时既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工业强国尝试,又有维新变法政治改革的努力,还有辛亥革命后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试验,可是这些道路的探索都相继失败。这清晰地告诉我们,照搬别国的路在中国行不通,继续走封闭僵化的路在中国同样行不通,必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道路,才能挽救民族危亡与实现民族振兴。中国共产党无可置疑的领导地位根植于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主动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寻找到适合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正确道路,根植于党成功解决了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两大历史性任务。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加快发展,我们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日益改善,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就是为什么被西方冠以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等称谓的根本原因所在。对比过去以欧美模式、苏联模式为分类标准的世界发展模式,中国模式是对人类现代化道路的创新,对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从而为发展中国家的追赶超越提供了新样本、新道路,同时,这不仅为民族复兴的道路自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使这一道路的话语具有世界范式意义。

(四) 100多年民主革命创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坚强的领导保证

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并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新型政党制度。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②。实践已经证明,这一新型政党制度超越了以金钱政治、票选竞争为特征的西方政党制度,丰富和创新了世界政党制度与政党治理形态,增强了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与政党话语自信。

近代以来,政党制度一度被固化为多党轮流执政,存在着把西方政党制度视为具有唯一现代性的政党制度的认识误区。习近平指出,中国政党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③,是摒弃西方政党制度弊端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1905年同盟会成立,标志着中国步入现代政党时代,上演了300多个政党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粉墨登场的“闹剧”。从1912年唐绍仪组建第一届内阁到1927年底,短短16年间共组阁45届,选出总统10人次、总理59人次。频繁的政党更替没有使中国实现民族复兴与国家兴亡,反而导致国家政治秩序混乱、社会动荡不安。1928年后,蒋介石集团选择一党专制的政党制度,大肆搞特务暗杀活动,打击和迫害民主人士,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也宣告了一党专制政党制度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33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9页。

③ 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41页。

在中国的失败。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激烈斗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通力合作、团结和谐的新型政党关系。1949年9月,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顺利召开,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各党派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通过参加政协会议、担任领导职务、开展民主监督、进行决策建言等形式参加国家政权建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在广泛的民主协商实践中得到巩固和发展。反观当下的西方政党制度,各党派围绕选票开展多重利益博弈,呈现出政权更替失败、政治秩序混乱、社会治理失灵等乱象。事实上,政党治理应该通过共存、共商、共治、共享的民主协商手段最大程度地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凝聚社会共识,而不是政党之间的相互倾轧与资源内耗。100多年来的政治实践证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但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汇聚起各党派团体、各社会阶层的复兴磅礴之力,调动起民众参与政权建设的最大积极因素,而且创新了世界政党制度,形成了政党治理的中国话语范式。

三、民族复兴话语的现实叙事:世界话语系统的建构与话语权提升

话语体系和话语权作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以强大的话语叙事来营造民族复兴的良好国际舆论环境,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叙事的过程就是意识形态传播的过程^①。在大历史观视阈下,只有将民族复兴话语彰显出的比较优势转化为一种能够深入影响国际舆论走向的世界话语体系,从话语传播理念、内容体系、传播策略等方面加强国际话语体系建设,才能增强国际社会对我们民族复兴的正确认知与理解,也才能为中国走向复兴提供更为有利的国际话语支撑。

(一) 明确民族复兴话语传播理念,增强中国话语国际影响力

话语是理念的载体,理念是话语的内核。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团结合作互助,是对以零和博弈、强权政治为表征的国际关系的重塑,也创造了国际关系话语新范式。尤其在话语霸权广泛存在的事实背后,要积极探索中国话语权的建构规律^②。加强民族复兴国际话语体系建构,需要倡导和谐共荣的新型话语理念,坚持破立结合原则,采取灵活多样的叙事方式,以多元叙事话语体系为民族复兴提供文化认同保障,不断提升民族复兴话语的国际影响力。

1. 打破西方“二元对立”话语陷阱,倡导和谐共荣的新型话语理念

面对西方话语霸权,中国经受的最大挑战之一是西方固守的“二元对立”话语模式。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威胁论”等西方话语在国际传播中不绝于耳,一度占据着国际舆论高地,折射出西方国家对中国民族复兴的认知偏见。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歪曲中国的和平崛起,提出中美最终会陷入大国霸权之战从而给人类和平带来威胁。实际上,这类话语霸权反映的是西方文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线性话语模式。由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不平衡性,西方国家率先开辟现代化道路,世界历史被西方社会简化为“先进—落后”“现代—传统”“西方—非西方”三种对立样态。这种单一化视角表现为以亨廷顿为代表的“世界文明冲突论”等言论,其实质是扼杀了不同文明之间通过对话形成和谐共荣发展的可能性。我们主张以文明多元共存来超越文明冲突的新型话语理念,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要打破西方的二元话语对立思维,解构世界“西强我弱”的不平衡话语格局,从现实叙事话语逻辑出发,通过多种传播声音、传播渠道和舆论平台来争夺国际话语主导权,建构一种更加多元共存的世界叙事话语对话交流体系。

^① 余保刚、许刘娟《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内在张力及其叙事整合》,《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② 谷照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构建中国话语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9期。

2. 破除大国崛起的固化印象, 推动世界现代化多元发展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对外交往之道, 我们进行民族复兴话语建构与传播要特别注意阐释清楚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这一重大问题。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 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融相通, 是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世界话语叙事要努力破除大国崛起必然走向霸权之路的固化印象, 向世人讲明白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探索本国发展道路提供积极的经验借鉴, 以赢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支持和认同。

世界现代化的发展历程表明, 西方主要国家在走向现代化时大都遵循“国强必霸”的发展逻辑, 通过殖民或者战争掠夺走上了强国之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 其中就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诬蔑为“新殖民主义”。而中国旗帜鲜明地向全世界宣告, 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绝不会称霸, 中国的民族复兴不但不会威胁到任何国家, 而且会给世界带来政治和平与稳定、经济繁荣与发展。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不仅致力于自身快速发展, 而且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方式主动让广大发展中国家搭乘中国的发展“快车”“便车”。当今世界, 西方发达国家数量上只占据少数, 发展中国家则占据多数, 因而我们的民族复兴话语传播对象要更多投向发展中国家, 积极构建世界大统战格局, 以多元化叙事来增强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民族复兴、和平崛起的话语认同。

(二) 建构民族复兴多元叙事话语体系, 增强中国话语国际说服力

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 就能掌握群众; 而理论只要彻底, 就能说服人”^①。这说明要想增强民族复兴话语的解释力说服力, 就必须积极建构能够把握时代脉搏、反映时代趋势、引领时代潮流的民族复兴多元叙事话语体系。

1. 丰富话语内容, 建构中国特色民族复兴话语体系

“民族的成长、强大不仅需要回溯历史, 还需要全球化体系所产生的一系列话语支撑”^②。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复兴多元话语体系, 需要从大历史观出发, 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来加强建设。一是从历时性维度加强民族复兴话语建构, 实现历史、现实和未来时间向度的有机统一。历史向度要求话语体系要溯源民族复兴叙事的历史逻辑起点, 从宏观的历史演进脉络中把握其发展逻辑。现实向度要求立足于中国和世界融通互动的时代课题, 尤其是把握好民族复兴话语的实践内涵, 注重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未来向度要求民族复兴话语权不仅要阐释清楚中国的当下问题, 还要对外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新理念。二是从共时性维度加强民族复兴话语建构, 在比较叙述中实现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有机统一。我们的民族复兴话语要包含“现代化的普适性要素、社会主义的特质性要素、中华文化的底层支撑元素”^③等多元话语要素, 宣传具有中国独特标识性的概念、范畴和理论的民族性话语, 比如新型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 同时, 我们还应大力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话语。

2. 讲好中国故事, 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讲好中国故事是我们增强民族复兴话语说服力、塑造良好中国形象的重要载体, “这对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继续沿着中国道路前进的信心和勇气、对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的认识至为重要”^④。做好民族复兴的生动故事叙事需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要结合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等特色话语元素, 更加充分鲜明地传递中国故事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习近平曾提及他在国外出访中, “不论是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第9—10页。

②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王宪明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第59页。

③ 韩庆祥、张健《论“五维中国”: 解释当代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的一种学术框架》, 《江海学刊》2020年第1期。

④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年版, 第208页。

谈、交流还是演讲,都要讲中国道路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讲中国梦的背景和内涵,讲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和主张”^①。这就是为了让国外民众更好地了解我们民族复兴话语背后的特定历史意蕴和文化内涵。二要借助各种通俗化、形象化的故事载体进行传播,让中国形象更能够打动、感染、走近国外公众。当前要集中讲好民族复兴的四类故事:一是国家友好交往的故事,二是人民友好交流的故事,三是文化相互融通的故事,四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要凭借生动的故事叙事,改变过去中国形象在国际传播中“他塑”的劣势,自塑起一个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的形象。

(三) 创新民族复兴话语传播策略,增强中国话语国际传播力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当今中国是开放的中国。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需要更好了解世界,世界需要更好了解中国。”^②要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就必须不断提升我们民族复兴话语的国际传播力。这要求民族复兴的国际话语传播要在准确把握话语国际传播规则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传播渠道,将“陈情”和“说理”相结合、“自己讲”和“别人讲”相结合,不断增强话语传播的感染力。

1. 把握民族复兴话语的国际传播规则,增强传播效果

在开展民族复兴国际话语传播时,只有准确把握和遵循国际话语传播规则,才能有效提升话语传播效果。为此,一要做到平等对话。在民族复兴话语对外表达和阐释过程中,要坚持话语传播主体和受众对象的平等地位,反对话语霸权行径,尤其是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时,要尊重他们本国的历史文化特点、传播方式和语言习惯等。二要增强话语亲和力,扩大国际共识。我们既要站在中国立场上积极传播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族复兴话语,还要注重求同存异、接纳世界各国人民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只有贴近传播对象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心理所需,才能获得最佳传播效果。因此,要注重话语传播受众的共通之处,努力凸显我们民族复兴的国际意义与互利共赢的价值理念追求。

2. 创新民族复兴话语的传播渠道,拓展传播范围

为了进一步丰富民族复兴话语的传播渠道、扩大话语的国际传播范围,要积极运用多种媒介,打造多链条、深层次、互动式传播矩阵。一要发挥媒介的“扩音器”功能。相关部门要主动利用信息化时代的各种新兴媒体,采用媒介视觉听觉等多样化的叙事形式,讲透讲活民族复兴的中国故事。二要加强翻译传播工作,正确表达话语背后的意涵。中西语言差异使得对外话语传播存在一定障碍,西方世界对中国话语的误读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语言翻译不准确造成的。因此,对外翻译传播中要避免抽象晦涩的表达,以准确的翻译来正确反映我们民族复兴话语的丰富内涵,让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清、听得明白。此外,人际传播也是话语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随着国家之间民众交流交往的增多,可以通过中国对外留学机构、在华留学生、访问学者、爱国华人华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等话语群体加强民族复兴话语传播,通过孔子学院、孔子学堂、国际学校、国际学术组织等话语机构扩大宣传范围,让民族复兴故事得到更为广泛有效的传播,提高中国话语的传播力。

[责任编辑:魏 磊]

^①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10页。

^② 《习近平书信选集》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07页。